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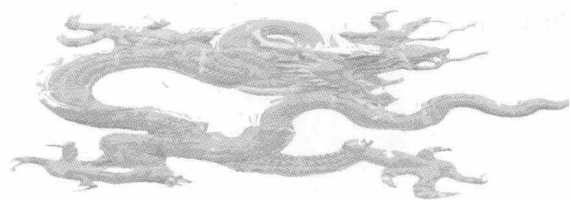


主 编 陈学恂
分卷主编 高 奇

中国教育史研究

ZhongguoJiaoyushiYanjiu

现代分卷



主 编 陈学恂
分卷主编 高 奇

中国教育史研究

ZhongguoJiaoyushiYanjiu

现代分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史研究/陈学恂等主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1

(中国教育史研究)

ISBN 978-7-5617-7382-6

I. 中… II. 陈… III. 教育史—研究—中国 IV. 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4115 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

主 编 陈学恂

分卷主编 高 奇

责任编辑 金 勇

审读编辑 赵成亮

责任校对 邱红穗

装帧设计 高 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4.25

字 数 38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1000

书 号 ISBN 978-7-5617-7382-6/G·4253

全套定价 580.00 元(共七卷)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前 言

本书是哲学社会科学国家重点研究课题——多卷本《中国教育史研究》中的现代分卷,研究中国现代教育(自1912年至1990年)发展历史的专著。

编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论述中国现代教育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全书以年代为纵线,以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及其发展过程为节点,着重研究影响和决定我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因素,现代教育发展的阶段,所形成的历史特点,教育状况与水平,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等,以达到比较全面地反映和总结我国的现代教育,保存中国现代教育信史的目的。全书以论统史、寓论于史,脉络清晰,立论有据,在史料的发掘与选用方面有较多突破。本书可供教育理论工作者、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师范院校师生及史学工作者参考。

多卷本《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总主编为杭州大学陈学恂教授。陈学恂先生生前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具体的指导,我们对他表示深切的敬意和怀念。本分卷主编为北京师范大学高奇教授,参加编写的还有何晓夏、俞启定教授,史敬寰研究员。全书共十三章,其中第一、二、五、六章由何晓夏执笔,第三、十章、第九章第三节由史敬寰执笔,第四、七、八、九、十二章及第十三章第一节由高奇执笔,第十一、十三章由俞启定执笔。全书由高奇统稿、定稿。

华东师大、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师大、杭州大学的专家及出版单位的代表,对本书初稿提出过宝贵意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此次再版在全书总体结构不变的原则下,对原书增补少量内容和史料,调整个别章节,对全文进行了全面修正。

限于我们的水平和掌握的资料,疏误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09年3月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与壬戌学制 / 1

- 一 新文化运动与教育改革 / 1
- 二 壬戌学制 / 16
- 三 新学制颁布后的各级各类教育 / 31

第二章 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产生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教育 / 41

- 一 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 41
- 二 新民主主义教育纲领的提出与工农教育运动的兴起 / 50
- 三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教育 / 61
- 四 教育独立运动 / 69

第三章 教会学校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 73

- 一 民国政府关于教会学校的政策法令及民国初年教会学校的基本情况 / 73
- 二 巴顿调查团与在华传教士教育政策的调整 / 79
- 三 非基督教及收回教育权运动 / 81

第四章 教育流派与教育团体(上) / 87

- 一 蔡元培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及对我国教育的影响 / 87
- 二 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 / 98

第五章 教育流派与教育团体(下) / 116

- 一 陶行知与生活教育社 / 116
- 二 陈鹤琴与儿童教育社 / 129

第六章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教育 / 140

- 一 教育方针政策 / 140

- 二 教育行政制度与学校系统 / 142
- 三 教育的实施 / 144
- 第七章 乡村教育运动 / 160**
 - 一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 / 160
 - 二 晓庄师范和山海工学团 / 165
 - 三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定县实验区 / 167
 - 四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 170
 - 五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民众教育实验区 / 172
- 第八章 抗日战争前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教育 / 177**
 - 一 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宗旨 / 177
 - 二 大学院与大学区制的始末 / 188
 - 三 中等教育改制与中小学会考 / 195
 - 四 教育法规建设 / 203
- 第九章 抗战八年的教育 / 228**
 - 一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教育方针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 / 228
 - 二 国民党政府的平时教育政策与战时教育措施 / 242
 - 三 “伪满”的殖民地奴化教育 / 268
 - 四 爱国民主教育的发展 / 274
- 第十章 学生的民主运动 / 280**
 - 一 战后国民党统治地区教育的衰败与反动 / 280
 - 二 波澜壮阔的学生民主运动 / 285
 - 三 学生运动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 289
- 第十一章 建国初期的教育改革 / 292**
 - 一 改造旧教育的基本方针、政策 / 292
 - 二 对旧教育体系的改造 / 294
 - 三 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 / 309
- 第十二章 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的教育 / 329**
 - 一 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提出 / 330
 - 二 毛泽东论教育改革 / 332
 - 三 教育改革 / 334
 - 四 各级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 346

第十三章 全面恢复与改革开放初期十年的教育 / 353

- 一 “十年动乱”中教育蒙受的损失 / 353
- 二 教育上的拨乱反正 / 359
- 三 新教育方针的提出 / 360
- 四 教育体制改革及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 / 363

结束语 / 375

主要参考书目 / 379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与壬戌学制

一 新文化运动与教育改革

(一) 辛亥革命初期的教育改革

中国的新教育始自清末,1903年癸卯学制的颁布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儒学教育体制。但癸卯学制是清王朝的学制,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性。我国教育真正民主化的改革和现代化的进程是从辛亥革命后开始的。这一方面由于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在《临时约法》第六条中规定“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确立了民族资产阶级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有经营资本主义企业之自由权。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设实业部。因此,在辛亥革命初期出现了一股发展民族经济的热望,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民间实业团体纷纷兴起。1912年1月上海有中华工学会的组织,宗旨为:“甲,工程营造之统一;乙,工程事业之发达;丙,工程学术之日新。”同年1月5日,中华民国实业协会在南京开成立大会,宗旨为:“振兴实业,扩充国民生计,挽回利权。”二月间上海有中华民国商学会之组织,宗旨为“征声气之应求,为知识之交换”等。^①这种兴办实业的热望和民族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教育改革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后掌握政权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所进行的改革,如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课程标准》,废除清朝的教育宗旨,颁布“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新教育宗旨,形成了新的壬子学制等,意义重大,为我国教育民主化、现代化改革奠定了初基,是以后一系列改革的开端和序曲。

(二) 封建主义思想与教育沉渣的泛起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大总统职位,篡夺了革命政权,建立了北洋军阀政府,为配合复辟帝制,在思想上和教育上掀起了一股复古主义的逆流。1914年袁世凯发布“祭孔告令”,声言“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②要求祭孔朝圣,恢复读经。一些清朝遗老积极筹建孔教会,鼓吹立孔教为国教。1913年宪法草案更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

^① 《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49页。

^② 《政府公报》,1914年9月26日。

之大本”。

1915年1月和2月,北洋军阀政府以大总统令形式先后公布《特定教育纲要》和《颁定教育要旨》,公开否定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恢复尊孔读经和儒学的正统地位。规定“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①要求中小学教员“宜研究性理,崇习陆王之学,导生徒以实践。教科书宜采辑学案,以明尊孔尚孟之渊源”。^②在“教科书”一节中规定:“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初等小学读《孟子》;高等小学读《论语》;中学校读《礼记》、节读《曲礼》、《少仪》、《大学》、《中庸》、《儒行》、《礼运》、《檀弓》等;“中小学校国文教科书除编者外,应读《国语》、《国策》,并选读《尚书》,以期养成政治知识。”^③在“建设”一节,规定:“经学院,宜于大学校外独立建设,按经分科,并佐以京师图书馆以期发明经学之精微。”“提倡各省各处设立经学会,以为讲求经学之所,并冀以养成中小学校经学教员及升入经学院之预备,由教育部通咨办理。”^④

在《颁定教育要旨》中,进一步阐明教育宗旨之总精神为“矩矱本诸先民,智慧求诸世界”,“于忠孝节义植其基,于智识技能求其阙”。^⑤具体地规定了“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的教育宗旨。上述规定,是教育宗旨上的大倒退,实为清末颁布的教育宗旨的翻版,不同的在于加了“戒贪争”、“戒躁进”两项,这两项是针对当时形势,专为对付资产阶级革命力量而提出的。教育宗旨的复辟、倒退,导致了教育内容上尊孔读经的重现,同时也影响了学制的变化。

民初学制取消了贵胄学堂,教育的等级性及封建特权被废除。但1915年的《特定教育纲要》又开始以国民学校和预备学校之分改变小学平等义务教育的性质,从高低起将学校分为升学与不升学的两种,年限、科目及程度均有明显的不同。在教学内容上,教育总长章士钊1925年10月在其主持的修订中小学师范学校法令会议上,通过恢复读经科和文言文的决议,要求从小学四年级起开始读经。一时间,地方军阀的封建复古主义也很猖獗,张作霖在东北禁用国语教科书,山东张宗昌于1925年通令小学一律添设读经班,等等。

①②③④⑤ 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234页。

（三）波澜壮阔的反封建文化的斗争

上述复辟措施因帝制失败而被废止,但不久又出现张勋复辟的闹剧,沉渣再次泛起。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进一步壮大,逐渐形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为了反对帝制,推进民主革命,从1915年起,在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中兴起了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既是辛亥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继续,也是新的民主主义斗争的开端。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①这场运动是以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为核心的,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②为运动开始的标志。《新青年》杂志也就成为这场运动重要的理论阵地。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联合阵线,向封建主义展开斗争。“五四”新文化运动,涉及政治、思想、道德、文学、教育等各个方面。由于这场运动开始于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批判,所以反对尊孔读经,反对旧礼教、旧道德,就成为斗争的中心内容,由此把对北洋军阀复古主义教育的批判,推向了新阶段。主要表现在:

1. 揭露尊孔与复辟的关系

陈独秀撰文《复辟与尊孔》,指出“祀天者,帝政之典礼也”。因此,“复辟论相依为命之尊孔论”两者是不可分离的。“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及言治。”^③对此,李大钊在《孔子与宪法》一文中也有揭露。他指出孔子已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而宪法则是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宪法则是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因此,“孔子与宪法”,本是“渺不相涉”、并不相容的,但在北洋军阀政府的宪法草案中却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真是怪诞之事。在宪法中确立尊孔这是“欲以宪法之权威,为孔子壮其声势”,^④是“专制复活之先声”。他们在“五四”时期已经揭露了在中国近代每一次政治上的反动与倒退,都必然在教育上泛起一次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② 陈独秀:《复辟与尊孔》,《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第265页。

③ 李大钊:《孔子与宪法》,《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第262页。

尊孔读经的沉渣的原因。

2. 揭露封建礼教的罪恶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反对尊孔读经的核心,是无情地揭露封建礼教之残害人性、奴役人的精神,号召人们抛弃这种旧道德、旧礼教。陈独秀指出,儒家三纲学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其道德都是“奴隶道德”,这套封建道德、封建礼教,代表君主贵族的利益,与国民幸福无关。他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九一六年》等文章,对儒家三纲之说进行猛烈抨击,指出它们是奴隶的、保守的、退隐的、锁国的、想象的;提倡在青年中要树立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新思想。

鲁迅在这个时期激烈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曾发表《狂人日记》、《我的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对礼教吃人及君权、夫权、父权进行揭露。他在1918年5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狂人日记》,借“狂人”之笔,愤怒痛陈礼教“吃人”的罪恶。他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①鲁迅后来发表的很多作品更加生动形象地揭穿了封建礼教的这种罪恶,塑造了祥林嫂、孔乙己等被封建礼教“吃掉”的一批人物形象,至今还起着深刻的教育作用。

在南方,被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也是新文化运动中一位活跃的人物。他发表《家族制度的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说孝》、《吃人与礼教》等文章,斥责儒家封建主义的旧道德为“吃人的礼教”,历来都是封建势力统治人民的御用工具。他在《吃人与礼教》一文中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端,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都是“一面讲礼教,一面尊孔子,一面吃人肉”的。

这些批判对于解放思想,使学校教育从旧思想旧道德的束缚与说教中解放出来,具有重要意义。

3. 从经济上分析儒家学说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原因和必然动摇的历史趋势

新文化启蒙运动所以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批判封建主义旧道德、旧思

^① 《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2页。

想,是因为这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中已有像李大钊、陈独秀等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们在斗争中已开始力图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解释社会现象,引导着这次批孔运动向纵深发展。李大钊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如《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等,开始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对儒家学说的历史作用与产生发展和没落的历史趋势作出科学的解释。他指出,孔子学说支配了中国思想界二千多年,这并不是这种学说本身有那么大的绝对权威,是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而是因为“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为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样相沿下来,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沉沉的农村生活相照映,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现出一种死寂的现象”。^①这种适应于小农经济与宗法家族制度的学说,到了中国近代,小农经济动摇了,大家族制度也开始瓦解,孔子学说赖以产生和维持下去的基础动摇了,便必然要产生一种新思想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因此,反对袁世凯等的复辟倒退,便必然要反对他们泛起的“尊孔”、“读经”的逆流,彻底反封建,就必须打倒孔家店,这便成为一条历史规律,而“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不是对孔孟等圣贤本人的攻击。他说明:“余之诘击孔子,非诘击孔子本身,乃诘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诘击孔子,乃诘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②这样,李大钊便初步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儒家思想的产生、作用及必然成为过去的历史趋势。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复古主义思想,在批判封建教育的核心——儒学——的深度上超过了以往的各种批判,这场斗争对“五四”以后的教育改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也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历史、对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

①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7页。

②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选集》,第80页。

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①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也影响了以后的一些教育改革活动。

(四) 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随着民主与科学思想的传播,以民主主义教育与科学教育为中心,对教育的内容、方法、制度等均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推动了教育领域中的全面改革。

1. 关于教育宗旨

袁世凯在其执政时期,推翻了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新的教育宗旨。1915年到1916年,虽已从教育政策法规上否定了北洋军阀政府在教育宗旨上对民初资产阶级教育宗旨的反动,保卫和恢复了民初的教育方针,但是不久在各种教育思潮的影响下,教育界对教育宗旨又提出新的看法。1918年12月,教育部组织由范源濂、蔡元培、陈宝泉、蒋梦麟等参加的教育调查会。他们于1919年4月提出教育宗旨应为“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并对此作出具体解释。所谓健全人格,即:(1)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役社会国家之本;(2)人生所必须之知识、技能;(3)强健活泼之体格;(4)优美和乐之感情。所谓共和精神,即:(1)发挥平民主义,俾人人知民治为立国根本;(2)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俾人人能负国家社会之责任。^②后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影响下,1919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又提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本义,废除教育宗旨。当时教育部虽未同意这个意见,但到1922年制定新学制时,只提出了7项标准,未定教育宗旨。这7项标准是: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地方伸缩余地。这7项标准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中对教育改革的总要求。

2. 女子教育的改革

从教育制度上开女禁,妇女可以接受学校教育,是在清末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开始的,但当时女子只能入小学堂和师范学堂,并且要男女分校、分班受教。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较清代有了较大的进步,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高小以上分别设立。中等教育男

①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32页。

② 《教育杂志》,第十一卷第五号。

女皆可同等享受,但在高等教育阶段女子只能进高等师范学校。在1915年袁世凯公布的《国民学校令》中,只允许小学一、二年级男女同学;三年级以上男女学生,只可同校,不可同级。因此,妇女的受教育权仍然是有限度的。新文化运动中,争取男女平等权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批判封建旧思想、旧道德的同时,也批判了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主张男女平权,进一步开放女禁,更广泛地兴办女子学校,并且实行男女同学。在1917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年会上,女子教育是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年会向教育部提出了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对此,1918年6月,教育部通知各省区酌情办理。在这种情况下,1917年,北京女子师范开办国文教育专修科。1920年,正式成立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先允许9名女学生为旁听生。继之,1920年,北京大学首开先例招收女大学生;之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校也相继招收女生。1921年以后,全国各大学均招收女生了。据统计,1922年全国除教会学校外,入高等学校的女生共计665人。关于男女同学问题,1919年后高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一般中等学校仍分别设立。但少数比较进步的中学,如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广东省立中学等校则男女均收,甚至男女同班。虽然这时女学生比男学生人数少得多,受教育层次总体上比较低,但女子终究争到了自小学至大学受教育的权利,进一步突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防线,可以同校甚至同班,使“五四”时期在女子教育的发展史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

3. 采用国语及白话文教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文学革命和国语运动。包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抨击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出现了不少新的文学作品。不仅促进了文风的改革,同时也起到了宣传民主思想的作用。这些作品有的成为学校国语教材和课外读物,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促成学校从这个时期开始采用国语和白话文教学。

国语运动最初与义务教育运动紧密相联。义务教育早在清末就已提出。壬寅学制中已有了教育制度上的规定,甚至1915年袁世凯颁发的《教育纲要》中也有明文规定,并责成当时的教育部长汤化龙拟定了义务教育的实施程序共31条。但二三十年间义务教育唤来唤去均属空话,未见实行。为便于推行

* 白话文,又称“语体文”,与“文言文”相对。

义务教育,自十九世纪末便有人开始提倡国语。针对文言文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不易普及教育等不利因素,开始了一个以改革中国文字,统一中国语言,要求言文一致为中心的运动,目的使文字接近生活,使民众易于接受,促进教育的普及。国语运动的内涵包括“切音”、“简字”、“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新文学”等诸多方面。最早提倡者为卢懋章。他于1892年发表《切音新字序》,对这一运动的意义作了说明。后来黎锦熙曾对这一运动作了分期。他在《三十五年来之国语运动》一文中提出:第一期是在1898年上下十年间,为“切音”运动时期,以卢懋章为代表;第二期是1908年上下十年间,为“简字”运动时期,以王照、劳乃宣为代表;第三期是1918年上下十年间,为“注音字母与新文学”联合运动时期,以王璞、吴敬恒、胡适等人为代表;第四期是1928年上下十年间,是“国语罗马字及注音符号”推进运动时期,以黎锦熙、钱玄同为代表。这个运动一直持续下来,建国后采用的汉语拼音、简化汉字及推广普通话等仍属这个范畴。新文化运动期间主要是处于注音字母及文学革命阶段。

为统一国语,必须先从统一读音入手。1913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议定了注音字母共40个,用以标注汉字的读音,借助于字母拼读学习汉字。1916年北京组织“国语研究会”,为促进国语运动的机构。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注音字母,1919年又重排一次。

为推动言文一致,1919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改中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当时这场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密切配合,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语言文学的改革运动。在此推动下,教育部于1920年1月明令公布全国各小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改用语体文教授,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文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也都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逐步采用语体文。这是各级学校教学上的重大改革,是中国教育的一大进步。

4. 大力倡导科学教育

“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也推动了科学教育的进一步实施。《新青年》杂志指出:“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①在提倡科学、尊重科学、反对迷信,“拥护‘德先生’的必拥护

①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

“赛先生”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产生了研讨现代科学和提倡科学教育的组织——“中国科学社”,教育工作者撰写了不少关于科学教育论文。范源濂的《今日世界大战中之我国教育》,蒋梦麟的《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和平与教育》,任鸿隽的《科学与教育》等都阐述了科学教育的意义和实施办法。指出:“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与心能之训练。”^①这种“心能”的训练是指通过科学教育使人真正具有一种科学精神,以此研究科学、学术可取成果,以此对待社会,社会才有稳固之基础。提倡在学校注重科学“以养成真实正当之知识”,同时“具科学之精神”即“好求事实”,“欲养成头脑清楚之国民,科学其圣药也”。^②他们认为不注重科学,是中国旧教育的一大弊端,而人们没有求实精神,迷信权势,常为感情所蔽、私见所移,善于记忆模仿等更是社会难以进步之所在,而救治的重要途径就是提倡科学。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与推动下,学校自然科学的教学得到了重视和改进,加强了理科设备和教学实验,提倡学生动手去做,自己采集动植物、矿物,制作标本模型,供教学观察。科学教育思潮也包括以胡适为代表的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论的提出。还有一些教育家开始了以实验、测量等科学方法研究教育问题的尝试,促进了教育的科学化。

5. 北京大学改制

北京大学前身为清末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年2月,严复被任命为大学堂总监督。5月,改称为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称校长。在袁世凯对北京大学的摧残下,严复无从办学,12月便辞职。以后章士钊、马良、何燏时、胡仁源等继任校长。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采取高压政策,不停地提出合并、解散学校的计划。

从民初到1916年,北京大学在艰难的条件下,有了一些发展和改进,学生超过1500人。但很多方面仍沿袭“戊戌大学”的旧貌,远未成为一所现代的新式大学。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职。1917年1月4日,蔡到校视事,北京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时新文化运动已蓬勃兴起,蔡元培以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丰富的学识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北京大学的改革是

① 《科学与教育》,《科学》,第一卷第十二期。

② 《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教育杂志》,第十卷第十号。

当时大学改制的典型,因此也影响着全国高等教育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下述几方面:

(1) 树立新的办学宗旨,改变读书作官之观念。蔡元培主持学校后,首先提出要端正办学宗旨,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对学生提出三点希望,第一点便是要求学生树立正确的求学目的,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上大学应“为求学而来”,大学学生,应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批评原学校的腐败,学生求学以作官为主旨,“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① 以这样的人生态度和学业水准,若出校任事,则害了国家;若去教学,则害了学生,必须纠正。为此,他大树学术研究之风,成立各种研究会。提倡“砥砺德行”,组织进德会。主张人人奋争,反对堕落,发起各种有益的课外活动,抵制低级腐败的坏习气,树立“敬爱师友”的风气,扭转靠师求官的歪风。

(2) 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蔡元培首先从整顿文科入手,广延有学识并能热心教学的学者。他到校主事不足十日,便请来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积极推动北大的教学改革,并以《新青年》为阵地,推动北京大学的民主运动。1917年11月,李大钊应聘任图书馆主任,后来兼任经济、史学等系教授。1920年8月,鲁迅受聘成为北大兼职讲师。聘请的教师还有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杨昌济、马叙伦、陈垣、徐悲鸿等,他们都是学有专长、很有造诣的学者。胡适在1917年底到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他是用西方哲学观点、方法系统整理中国哲学史的一个人。他积极提倡白话文,在教育界很有影响。理科也有一支很强的教师队伍,夏元瑛为理科学长,教授有李仲揆、冯祖荀、颜任光、李书华、秦汾、俞同奎、何杰、翁文灏、葛利普等。原法科教员中很多由政府官员兼课,蔡元培到校后规定,政府官员不得为专任教员,专任教员不得在他校兼课,因此增聘此科专任教员,当时马寅初、陶孟和、周鲠生、高一涵、陈启修等国内有名学者都是北大法科教员。蔡元培任用教员,只看学问,不顾权势地位、资历。本着人才主义原则,他还辞退了一批不称职的中外教员,甚至很有背景的英籍、法籍

^①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页。